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研究

The Analysis of jingjikao in the
QING CHAO XU WEN XIAN TONG KAO

李立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研究

The Analysis of jingjikao in the
QING CHAO XU WEN XIAN TONG KAO

李立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 / 李立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161 - 9836 - 0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经籍—考证—中国—清代
IV. ①Z126. 274.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75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吴丽平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1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一

李立民博士早先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问历史文献学，得陈援庵先生治学之法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继之入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专攻晚清历史文献。鉴于刘锦藻所辑《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学术价值，而以往文献学界又少有专题论究，乃由刘考辑录之群书序跋入手，搜寻其史源，评鹭其得失，进而据以知人论世，深入探索，遂成此《〈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大著。

清代学术宏深，以总结整理吾国数千年学术为特征。二百数十年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贡献。晚近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大”字言清初，以一“精”字言乾嘉，而于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则归结为一“新”字。在迄今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谈到清初学术之博大，乾嘉学术之专精，恐怕论者已然大体形成共识，当无太多异议。然而如何理解静安先生论道咸以降学术所用之“新”字，则似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应已故友人鲍国顺教授之约，前往台湾高雄中山大学问学。其间，有幸参加清代学术研讨会，曾以《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为题撰文，向与会四方专家请教。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将旧日拙见大要奉上。

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之前列，为中国社会之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王国维先生以一“新”字来赅括晚清学术，得其大体，洵称不刊。晚清七十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七十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原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

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因此，王国维先生所说之“新”，既指晚清方兴未艾之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三百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欣逢立民博士大著出版，谨以上述文字奉附骥尾，敬请方家大雅指教。

陈祖武 谨识

二一六年三月七日

序 二

清人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① 指的是利用书目查检图书，明辨典籍版本与卷帙分合，寻得正确的读书门径，所以说书目是读书做学问的入门之学。然而，目录学的功用还不仅仅是这些，与王鸣盛同期的章学诚就曾指出：“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② 他洞幽烛微，揭示了目录学在学术史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这是对书目之用在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当然，在章学诚看来，古代目录学史上真正能做到推阐大义、叙列九流的书目并不多，除刘向父子、郑樵等人之作外，大多数目录乃“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③，是不能入其法眼的。不过在今天看来，不仅那些带有类序的书目能在序言中条理各类典籍的渊源流别、授受得失，发挥学术简史的作用；那些只作部次甲乙、以备稽检的目录，不也记录了各个时代流传的典籍，为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吗？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其实透过目录学也可以做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也可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比如，利用晚清的各类书目，庶几可从一个窗口透视中国近代史上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与变革的流变，及其彼此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当目录学与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时，书目之用大矣哉！21世纪以来，西方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新书籍史”研究，其大致取向和研究范式，亦不外乎如此。

李立民博士的《〈清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就是一部以目录学研究为主，结合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多维度交叉研究的著作。《清

① 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页。

② 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二《焦竑误校汉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是继《四库全书总目》之后，专门记录清代典籍的一部辑录体解题目录，其学术价值有胜于《清史稿·艺文志》等书目之处，然长期为学界所忽略，未有专门研究的论著。立民博士的著作既从内容体例、分类体系、史料来源等方面考察了《经籍考》的得失，又从学术史、思想文化内涵等方面论述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时代思潮与文化特征。

通览全书，我认为颇值得称道者有两点。一是书中严谨扎实的文献考辨功夫，体现了传统目录学的治学宗旨。这些缜密周匝的考证既反映在一至三章对《经籍考》的指瑕匡正之中，又表现在第六章对《经籍考》目录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分析之中。尤其是第三章，立民博士用史源学的方法，钩沉索隐、纠谬补缺，订正刘锦藻引据之失及其按语不妥之处，以求更为准确地叙录清中后期传世典籍的状况。二是立民博士在书中将目录学研究与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多维研究的方法，不仅有助于说明《经籍考》记录清末典籍流通随社会变动而变化的学术史价值；也有助于通过一部书目的研究，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风气；甚至还有助于通过书目作者刘锦藻这一个案，考察中国传统学人在社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局限。

立民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拓展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视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毕业后他有幸追随名师陈祖武先生作博士后研究工作，此书便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对深化、拓展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成功尝试。书稿经5年多时间的反复修改，现将付梓出版，可喜可贺。立民君一向潜沉治学、心无旁骛，我最爱其书生本色、学人气质。相信他能够在学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积累、进取、创造和收获。

周少川

丁酉正月写于京师园

目 录

绪 言	(1)
一 研究目的	(1)
二 研究方法	(2)
三 研究意义与突破点	(3)
四 研究现状	(4)
(一) 研究《清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	(5)
(二) 对《清朝续文献通考》之评说	(6)
(三) 研究刘锦藻生平事迹	(8)
(四) 研究《清朝续文献通考》其他篇目	(9)
第一章 《清朝续文献通考》纂修始末	(10)
一 成书背景	(10)
(一) 吴兴自古学术风气与锦藻良好的文化素养	(10)
(二) 时局变迁与刘锦藻文化忧患意识	(12)
(三) 刘氏适时购书与藏书	(13)
二 编刊历程与参加纂修者考略	(14)
三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纂修概述	(19)
(一) 刘氏《经籍考》参编者存疑	(19)
(二) 两种版本《经籍考》之比较	(20)
第二章 刘氏《经籍考》内容结构分析	(22)
一 详细明晰的名目项	(22)
二 “总案语”评析	(24)
三 书后案语与读书治学	(25)
(一)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25)
(二) 辅助读书治学与提示学术门径	(28)
四 体例指瑕	(30)

2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

(一) 书名之误	(30)
(二) 卷数之误	(31)
(三) 作者之误	(32)
(四) 缺乏版本项	(36)
(五) 书后案语不足举例	(39)
(六) 互著别裁辨析	(43)

第三章 刘氏《经籍考》史源归纳与商榷

(47)

一 刘氏《经籍考》所用史源出处归纳	(47)
二 刘氏《经籍考》择取史源的宗旨	(49)
(一) 揭示书籍旨要	(49)
(二) 注重学术背景的引用	(49)
(三) 介绍作者行事	(50)
(四) 阐明刊印流传	(50)
三 刘氏《经籍考》史源不足举要	(51)
(一) 史源误引	(51)
(二) 史源节略失当	(52)
(三) 对史源缺乏考证	(53)
(四) 略去史源出处	(54)
四 史源商榷	(56)
(一) 经部	(56)
(二) 史部	(104)
(三) 子部	(124)
(四) 集部	(130)
(五) 丛书部	(137)

第四章 刘氏《经籍考》之图书分类

(170)

一 类目异同比较与刘锦藻对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之承袭	(170)
(一) 经部类目的增减	(170)
(二) 史部类目的规范	(174)
(三) 子部类目多有沿袭	(178)
(四) 集部类目稍有变通	(180)
二 固守传统学术体系下的图书配隶之失	(182)
三 刘锦藻传统的治学视野与四部分类法的运用	(187)
(一) 刘锦藻的“遗老”身份与其旧有的知识架构	(187)

(二) 传统四部分类法深厚的文化积淀	(188)
(三) 清中后期学术的发展与传统四部分类之停滞	(189)
第五章 刘氏《经籍考》收书与评书的时代烙印	(192)
一 “遗老情怀”与御敕图书的收录	(192)
二 朴学遗风与辑佚、考证类图书剧增	(195)
三 存古兴学与丛书云集	(198)
(一) 晚清社会新学思潮的影响与传统学术面临的挑战	(198)
(二) 经世的初步尝试:刘锦藻以“丛书”倡导对传统 文化的学习	(200)
四 爱国、经世之旨与晚清译著频现	(207)
(一) 刘锦藻治学视野的拓展	(207)
(二) 以晚清“译著”求国富民强	(209)
(三) 收书中西兼顾的文化价值观	(214)
五 文献学视角下的收书得失	(215)
第六章 刘氏《经籍考》之学术价值	(223)
一 与《书目答问》的关系	(223)
二 补正《清史稿·艺文志》及其《拾遗》	(225)
三 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互补	(227)
(一) 或可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误	(228)
(二) 有些图书优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	(229)
(三) 可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互补	(230)
四 补史料著录之阙,纠史传记载之误	(231)
五 弥足珍贵的传统社会文化财富	(233)
六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化走向	(235)
附录 刘锦藻生平学行辑要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71)

绪 言

一 研究目的

清儒王鸣盛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① 中国传统目录学可分为国家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三种类型。史志目录中，除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外，一些专史中也设有“经籍”一门。如“通考”类史著中，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肇端，其后相继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诸“通考类”经籍考，所著录图书一脉相承，与正史类史志目录一同成为指导读书治学的门径，是考察我国古代典籍流传、刊印的重要书目。然四部“通考类”经籍考中，由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两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收书大致相仿，故其学术研究价值不大。

清末民初年间，刘锦藻以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享誉学林，《经籍考》即其中一篇（以下简称“刘氏《经籍考》”）。该篇收录了上起乾隆五十年（1785），下迄宣统三年（1911）间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八千余部，其在编纂体例上取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每书下或辑录原书序跋，又间附案语略加考辨，是一部具有断代史性质的辑录体解题目录，成为继《四库全书总目》后又一读书治学的门径书目。但学术界目前尚没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往往多于所编史学、目录学专著中对此篇略有所评，扬抑参半。有鉴于此，笔者欲对该篇内容结构、图书分类、收书状况及史料来源等做一全面系统的考察，客观地评价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不足，从而为清中叶以降文献学研究的深入，试做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中国书店1937年版，第1页。

一些努力。

再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传统学术也随之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受此影响，一些原本思想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理念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刘锦藻即为其中之代表。其思想经历了由尊古信古到以书经世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是通过其对清儒学术著作的整理——《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而实现的。那么，刘锦藻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又是如何利用文献整理以实现其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的？对于当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影响？由此，笔者欲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所构建的传统学术体系加以剖析；从社会史、思想史的角度对其收书与评书加以阐释，从而揭示刘氏《经籍考》所载文献背后折射出的学人思想与时代印记。

二 研究方法

传统治目录学方法，是建立在严谨考证、辨伪、补逸等方法之上的。从考察一书所著录卷数之缺佚、版本之优劣、作者之真伪，到评其图书分类、收书得失，尤其是对一书书目解题之考证，广征诸家之说，言必实据，是对考辨性解题之再考辨。这种传统的治目录学方法，将目录中的文献作为考察中心，既能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从而为学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梳理脉络，提供治学之门径，其有裨于读书治学颇多。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却往往忽略了文献背后所反映的思想与文化。我们知道，目录是因文献而构成的，而文献又是文化之载体。因此，一部目录著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古往今来，学者们对目录著作之编纂，与其说是利用文献的实际需要，不如说是认知文化的必然选择，故一部目录著作也是对一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折射。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些学者企图打破目录学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了“文化目录学”的概念。但是，这种治学方法笔者认为略偏于强调“文化”，而忽略了对文献的传统考证。或者说，是将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单纯地框定在目录学中，似未做到较好的融合。

近些年来，文献学研究在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周少川先生在《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结合》一文中指出：“新世纪文献

学要有大的发展，应该注意交叉与综合研究，方能开拓出新视野和新领域。”^①他进而提出了古文献学研究当与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相结合的主张。笔者受此启发，一方面对刘氏《经籍考》做基础性的文献学研究，通过考察其编纂体例、解题之史源、图书类目设置与配隶等方面，以期为学者利用该书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准确、扎实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视角，将刘氏《经籍考》置于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传统学术近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将刘锦藻对文献的整理与其思想特点相结合，以期揭示刘书背后之时代思想与文化。

三 研究意义与突破点

本书的研究意义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本书利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对《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著录的清中后期典籍做了系统的考证，尤其是补正了该《经籍考》解题的史源，对清代目录学研究的深入或有所裨益。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书目答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拾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比较，揭示了该《经籍考》在目录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可以弥补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本书目录学与学术史、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对深化传统目录学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其二，清代学术成果汲取了以往各代学术研究之精华，是对我国古代学术的一次总结。特别是清中叶以降，清代学术的发展达到顶峰，又是对整个清代学术的浓缩。《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经、史、子、集四部收录了清中后期学者的众多著述，合观全书著录之四部群籍，俨然一部清中叶以降的传统学术文化史。因此，对《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考察清代中后期学术发展的特点及学术演变的脉络，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不无裨益。

其三，刘锦藻生活的时代、编书的时代都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期。《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记录的不仅仅是清中后期的文献，更是文献背后的时代思想与文化。因而，对该《经籍考》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在收书与评书方面的考察，有助于揭示传统学术转型期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治学思想、治学理念，从而有助于考察中国传统学人在社会近代化转型

^① 周少川：《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结合》，载《文献》2010年第3期。

过程中存在的价值、意义与局限。

四 研究现状

20 世纪初叶，姚名达先生著《中国目录学史》率先指出，刘锦藻《经籍考》可补《四库全书总目》之未备，但又称其“取舍任情，不能完备”^①。寥寥数语，未及展开。稍后的学者则对刘氏《经籍考》以赞誉为主，如金毓黻先生云：“锦藻虽续官书，实为私撰，愚检读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系解题，实远胜于《清史稿·艺文志》。”^②尹达先生进而认为，刘氏书“改进编纂方法，于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外，还略记撰述经过和作者生平；子部杂家列入清朝时所刻丛书 113 种，包括几千部几万卷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后清朝的重要著录”。^③

其中唯张舜徽先生用力最多，亦多有贬抑。张先生认为，“刘氏虽富有藏书，但是识不高、学不广，自然不能写成比较完善的《经籍考》，甚至有些错误是出乎意料的”^④。并指出刘书缺失主要有四：“收的书不太完备”，“分的类例不太清楚”，“解题中介绍作者生平的失实”，“解题中推论原书义例的失体”。^⑤进而认为，“由以上四点来看，刘氏的书比之《清史稿·艺文志》似乎还要差些”^⑥，书中“多不脱遗老气、腐儒气”^⑦。

当代其他学者，如台湾学者昌彼得、潘美月两位先生说，此篇“不能如马氏《通考》详赡”^⑧。蒋伯潜先生亦言：“民国初，刘锦藻《续皇朝文献通考》（笔者案：实指其中之《经籍考》一篇而言）收清高宗以后之书，但也不能完备。”^⑨进而认为，“这种通史艺文志，诚为需要，但其工作实非常艰巨，非以国家的力量，得学识精力俱绝者任之，断难成功”^⑩。徐国仟先生也说《续通考》《清通考》《续清通考》“这三种《经籍考》虽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3 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0 页。

③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4 页。

④ 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7 页。

⑤ 同上书，第 197—198 页。

⑥ 同上书，第 198 页。

⑦ 同上。

⑧ 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6 页。

⑨ 蒋伯潜：《校讎目录学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 页。

⑩ 同上。

然在体例上仿马氏的《经籍考》，但内容上的价值却远远不及马氏之书。无论从著录之多寡、考证之精当等方面，都不可与马书同日而语”。^①而瞿林东先生则赞云，刘氏《经籍考》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重要目录书，在历史文献学上有一定价值”^②。陈其泰先生也说，该篇是对清后期著述之总结，是刘氏对中国文化史之重要贡献。^③

刘氏《经籍考》实为《清朝续文献通考》之一门，故笔者对学术界研究刘锦藻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全书概况，略作调查，先简述如下。

（一）研究《清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

1. 研究其编纂目的。陈桂英博士分析了刘氏编撰此书目的在于总结清亡经验教训，“使后之当事者有所借鉴”^④。高翔先生还指出，“保存文化遗产，防止文献失散，也是刘锦藻编修此书的重要目的”^⑤。而陈恭禄先生则认为，刘氏仅从典章制度层面探求清灭亡原因属于内因，“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属于外因，编者认识显然不够全面”^⑥。

2. 研究其体例编排。呈现出两个研究特点：一是侧重梳理类目变化。如桂遵义、袁英光二位先生梳理了《征榷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王礼考》《兵考》《职官考》所增子目，简要说明了《舆地考》《四裔考》内容特点。^⑦二是侧重评价编排体例。如冯尔康先生评曰：本书体例多从“清通考”，但亦多增纲目，“添加的纲目，完全是从实际出发，使乾隆以降新的事物得以容纳进去，这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⑧。高翔先生也赞曰：该书所以在门类编排上突破前规，“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史学著作内容、体例发生变更的明显反映”^⑨。赵国璋、潘树广二位先生亦云：是书在体例编排上“不为旧编所囿，顺应时代发展，据时事增入银行、海运等新政，在反映清末经济、政治、交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较《清史稿》

① 徐国仟：《目录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②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③ 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近代时期）》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④ 陈桂英：《刘锦藻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实业考〉》，《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⑤ 高翔：《清朝续文献通考》，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页。

⑥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1页。

⑦ 吴泽主编，桂遵义、袁英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

⑧ 冯尔康：《清代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⑨ 高翔：《清朝续文献通考》，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第401页。

丰富而全面”^①。

3. 研究其编纂经过。项士元先生首先叙及此书编纂经过：“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年，增外交、邮传二门，为三百二十卷。嗣复与其子承幹商榷义例，补宪政、实业二门，都四百卷。同郡修律大臣沈家本为进呈御览，赏内阁侍读学士。”^② 金晓东博士则认为，刘氏于进呈该书后又多次修改，与清官修三通相比难度更大，直至刘氏去世之前才最终定稿。此外，金晓东博士还梳理了该书版本流传情况。^③

4. 研究其材料来源。此书材料来源刘氏未述，但高翔先生有所总结。他认为该书材料来源于各种章疏、公文、《会典》《东华录》等基本史料以及私家近时之作等。^④ 而戚志芬先生又指出，刘氏是浙江著名藏书家，其嘉业堂藏书甚多，又购得缪荃孙艺风堂藏书，“所以他能够以私人力量著成这部巨著，这与他的丰富藏书不无关系”^⑤。可知是书材料亦来源于刘氏自家藏书与购书。

（二）对《清朝续文献通考》之评说

1. 对优点之论

论其功用。清人陆润庠认为，刘氏此书“网络考订一朝典章制度，粲然大备，而于新旧蜕嬗之际，尤三致意，增立宪政诸门，详具源委”^⑥。读此书“推阐我朝立国之本，及列圣创法之意，与夫后之因革变迁，必有憬然于治乱兴衰之故，深瞶太息而不能自己者，拨乱世而反之正，抑将有取兹焉”^⑦。吴廷燮先生称：是书“载乾隆五十一年以后至光绪三十年政制之变通损益，为常人不及知不获见者颇多，是亦中国历代考国闻者之渊藪也”^⑧。方壮猷先生云：“欲考乾隆五十年以后制度文物者，自以此书为最便。”^⑨ 赵淡元先生亦指出其系统完整，条理清楚，“反映了清朝中后期政

①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79页。

② 宋慈抱著，项士元审订：《两浙著述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8页。

③ 金晓东：《〈皇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与学术价值》，《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

④ 高翔：《清朝续文献通考》，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第400页。

⑤ 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与丛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8页。

⑥ 陆润庠：《清朝续文献通考·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万有文库”本。

⑦ 同上。

⑧ 吴廷燮：《清朝续文献通考提要》，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第22册，史部政书类，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761页。

⑨ 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论》，（台北）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226页。